

跨文化研究

关于日本耶稣会士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

戚印平

(浙江大学 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传教士进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因是生存需要。在沙勿略传教日本期间,经费来源是马六甲地方长官赠送的30桶上等胡椒。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经费缺口越来越大。最迟在1571年,耶稣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在范礼安首次远东巡视期间,这一活动被制度化了。他与澳门商人行会订立契约,每年为教会提供50担生丝份额,并任命专事此职的管区代表负责商品储备及流通、销售、资金调配等商务活动。耶稣会士的商业活动在教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及葡萄牙国王多次下令禁止,教会内外的派系之争又使得这一争执趋于复杂,但生存需要仍使得这一备受争议的活动经久不衰。

[关键词] 日本;耶稣会士;商业活动

[中图分类号] B975;F7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3)03-0032-10

在有关耶稣会传教士的研究中,赢利性的商业活动是鲜有触及的一个领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此类活动很少见载于教会公布的官方文献;其二,经商活动有悖于传教士们道貌岸然的公众形象。但事实上,在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上半期,远东耶稣会士曾积极参加以生丝为基本商品的中日贸易,并从中获取维持传教活动的主要经费。

一

最早关注商业活动的传教士是耶稣会远东传教事业的开创者、后来被封为“传教圣徒”的沙勿略神父(Francisco Xavier)。他在抵达日本(1549年8月15日)的两个多月后,便设想在日本建立葡萄牙商馆。在同年11月5日于日本鹿儿岛致果阿戈麦斯神父(Antonlo Gomes)的信中,沙勿略不仅指出了建立商馆的合适地点,而且还附上了有利可图的货物清单以及交易的注意事项^①。无独有偶,在两年后前往中国时,沙勿略亦在1552年7月22日由新加坡海峡致葡萄牙商人迪亚哥(Diego Pereira)的信中提出了类似建议。他不无诱惑地声称:“如果能在中国设立商馆,国王陛下将

[收稿日期] 2002-10-18

[作者简介] 戚印平(1954-),男,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天主教东传史及文化交流史研究。

^① 沙勿略在信中说:“堺是个非常大的港口,是有许多商人与财主的城镇。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银子和金子。所以我想在堺设立葡萄牙商馆……如果把神父带到日本来的人携有这张目录上的商品,肯定可以得到大量的银子和金子。”他还颇为内行地指出:“从那儿来的船应满载货物,于4月从果阿出发,必须在马六甲装上必要的粮食,于6月份离港,而不可停靠中国,在那里交易或补给食物。如果缺水,可中途停靠某些岛屿,但必须尽快赶到日本,因为为交易而在中国停靠,从果阿到日本需要17个月;如果不在中国停靠,4个半月就能到达日本。”参见沙勿略《沙勿略全书简》,河野纯德译,平凡社1985年版,第510-512页。

会收到莫大的利益。我认为你必须向国王陛下详细说明这一点,并向印度总督报告此事。为此,我在一直开封的(由你送给国王与总督)信中写上了(在中国设立商馆)这一点,你可以看看。请你把写给国王的信与我的信一起送去。”[1](p.717)^①

最早将上述商业意图与中日贸易明确联系在一起的人,可能是后来因《日本史》与《口欧文化比较》而名垂史册的弗洛伊斯神父(Luis Frois)。1555年12月,他在前往日本途中于从马六甲寄出的信中颇为兴奋地说道:“我们去年在当地从来自中国的帆船听到下列事情。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来自鹿儿岛的一个大船队驶到中国,给了中国沿岸许多破坏。它们给人口众多的一个大都市很大打击,从这个城市中掳去了许多贵族。据说这种战争由来已久,很长时间内没有安定。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争执对于想去日本的葡萄牙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这么说,是因为中国人不能载着他们的商品前往日本,这对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交易是极为有利的。”[2](p.35)

关于传教士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首先,作为受葡萄牙国王委派前往远东的耶稣会士,他们必须服从帝国“胡椒与基督教”的海外政策。先后担任过日本及中国教区布教长一职的卡布拉尔神父(Francisco Cabral)在1584年6月25日于澳门致西班牙及葡萄牙国王菲律浦二世的信中,明确提到了传教士的这一义务:“第一,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与修道士,我有侍奉神、拯救灵魂的重大义务;第二,作为陛下的臣民与耶稣会的一员,我有侍奉陛下的义务。”[3](p.6)当然,卡布拉尔没有明言的另一个原因,是传教士的生存需要。显然,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是否拥有充足的经费,不仅关系到传教事业的成败,而且也是耶稣会士们能否生存的必要前提。

在远东耶稣会士的早期文献中,关于传教费用的记录极为少见。沙勿略只是在1549年6月20日致葡萄牙国王的信中,含混地提到马六甲地方长官在他前往日本时送的30桶上等胡椒^②。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出现。1566年1月24日,弗洛伊斯在写给果阿神学院某位修士的信中抱怨:“当地物价非常高。迄今为止,当地只有2位神父以及二三位仆人,我们只吃萝卜叶子、米,节日里也只食用少许咸鱼,尽管如此,一年的经费仍不止450克鲁扎多。”[4](p.176)

16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教会进入发展较快的增长期,但经费需求亦随之大大增加。1570年,第二任布教长费雷拉神父(Gaspar Vilela)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声称,每年的花费为2000克鲁扎多。1571年,他又将这一数额提高到3000克鲁扎多。1575年1月23日,第三任布教长卡布拉尔在写给果阿代理管区长曼努埃尔(Manuel Teixeira)的信中说:“在我来到该地时,每年经费在2000塔埃尔以上。这相当于3000克鲁扎多……现在每年必须有4000以上的克鲁扎多,而且这一数字还将不断增加。”1576年,卡布拉尔又提出了新的经费要求。他说:“现在,由于必须建造的教堂和住院,10000以上的克鲁扎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了这里的基督教界,每年还需要5000以上的克鲁扎多(的传教费用)。”[4](p.177)

在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o)1580年至1582年巡视日本期间,日本教会

① 参见《沙勿略全书简》第717页。将不封口的商业信件交给作为信使的葡萄牙商人,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细节。如果将这种富有挑逗性的暗示与耶稣会士此后的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或可有更多的感悟。

② 参见《沙勿略全书简》第430-431页。据译者考证,每桶胡椒约为400磅,30桶共12000磅,按当时印度市场的价格,价值约366克鲁扎多。虽然沙勿略没有记述出售这些胡椒的价格与其他细节,但收入肯定不会低于印度市场,或者更高。沙勿略传教日本期间,需要供养的人员很有限,除了他本人之外,只有同行的托雷斯神父与费尔南德斯修士,以及陪伴他们的两位中国仆人。按此人数计算,每人每年的费用不会少于73.2克鲁扎多,当无衣食之虞。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写给戈麦斯神父的信中特别说明:“……载来神父的船不要装过多的胡椒,最多80帕莱尔(相当于976克鲁扎多)。因为如前所述,在到达堺港时,带得少就会卖得好,可以得到许多金子。”(《沙勿略全书简》,第511-512页)需要补充的是,信中所言的克鲁扎多(cruzado)为当时通用的葡萄牙钱币,中国人称为“十字钱”。其比值因时、因地而异,但多数情况下,它与当时的其他主要货币如特卡特、塔阿尔、斯格特的比价不会低于1.5:1。

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高峰期,但与之成正比的是,传教费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578年,范礼安在从澳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将教会预算定为每年6000克鲁扎多[4](p.178)。但他在1580年8月6日于长崎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声称若要维持已经取得的传教成果,每年至少需要7000特卡特(克鲁扎多)[4](p.179)。时隔两个月,在同年10月于丰后召开的全体传教士协调会上,经费数额上升到了8000特卡特[4](p.179)。在范礼安离开日本的1583年,他在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又将这一经费预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为了维持目前的开销,修建住院和神学校,每年10000克鲁扎多是必要的。”并且声称:“要使(神父们)为日本而尽力,至少需要10000克鲁扎多的年收入和30000至40000的资金。”[5](p.53;p.140;p.142)

范礼安没有为这笔巨款的具体用途开列明细账,但他解释说:“在所有的住院中,现有我们耶稣会员84人到85人,其中有32名各国神父。修道士中有20名日本人,其余或是学生,或是助理修士(coadjutores)。在全部的住院中,除修道士之外还有约百名同宿者……因此,将他们与我们加在一起,我们的住院中养了约500人。”[5](pp.32-33)如果这一数字属实,那么,范礼安要求的10000克鲁扎多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人均消费额只有20克鲁扎多。与沙勿略时期相比,日本教会的实际消耗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①。因此,范礼安告诉总会长:“如果不补充收入,日本耶稣会和基督徒就有灭亡的危险,这是令人极为忧虑的大问题。我熟悉情况,但我不得不说,正是这一原因,才使我们始终生活在不安和苦恼中。”[5](pp.148-149)范礼安的这一警告或许有为争取更多经费而做的策略性的夸大其词,但它至少表明,经费问题的确是关系到教会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

二

与上述不断增长的实际需要相比,远东耶稣会传教士的经费来源一直缺乏保障。从理论上说,这些传教士拥有三个方面的经费来源,即葡萄牙国王和教皇支付的年金、在传教地购入的少量不动产收入以及信徒的捐赠。与信徒的捐赠相比,前两个方面的来源相对稳定,被称为固定收入。但是,由于牵涉到各方面的实际利益,固定收入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常常不能及时到位,或被挪作他用,从而使远东耶稣会的财政状况陷于入不敷出的困难境地。

根据日本教会《1581年度日本年报》的记载,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曾答应每年给予日本神学院1000克鲁扎多的津贴[6](p.32)。但范礼安1579年12月5日于口之津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却明确声称:“国王不会给予当地所必须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以无数的敕令给予了他们,印度也不会支付。因为国王在6年前每年要澳门支付给日本1000克鲁扎多,但迄今为止,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今后收到的可能性也很小。”[4](pp.362-363)1581年10月13日,新任日本准管区长科埃里神父(Gaspar Coello)亦致信总会长,声称:“葡萄牙国王答应每年在澳门给予1000克鲁扎多,但已经有七八年没有支付了。”[6](p.366)

或许是为了争取这些画饼充饥的国王年金,范礼安于1604年3月派遣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神父(Rodrigues Teuzu, Joao)作为中国及日本准管区的代表前往罗马。行前,范礼安交给他一份名为《中国与日本准管区代表、罗德里格斯应在罗马与总会长交涉事项的备忘录》,要求他“在回国途中,应尽力让国王确认在萨尔赛特答应的、每5年给予日本的5000克鲁扎多捐款,并设法使它成

^①但是,因与范礼安在传教策略上的分歧而被迫辞职的前布教长卡布拉尔神父在稍后的1583年10月5日从澳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对三个传教区的经费使用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逐一例举了每个住院的具体开销,并统计说:“丰后、京都以及准管区长的经费加在一起,合计为2545塔艾尔。再加上超过910塔艾尔的‘下’的住院的经费,总共为3455塔艾尔。这3455再加上作为临时费用而增加的1000塔艾尔和另外一些费用,合计为4455塔艾尔,这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参见《耶稣会与日本》,第21-24页。

为不需要一再确认的永久性的、或尽可能长久的份额”[3](p.264)。

不知是由于耶稣会士的游说效果,还是出于远东地区保教权的政治需要,葡萄牙国王不久便提高了日本教会年金的数额,并在1607年8月2日发布的敕令中确定:前国王菲利普二世支付给日本耶稣会士的1000克鲁扎多将是永久性的。此外,再付给2000克鲁扎多的新年金。与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答应支付的1000克鲁扎多的年金合并,年金总额为4000克鲁扎多。但是,国王为这笔年金的支付设置了许多附加条件,如新增加的2000克鲁扎多将由印度支付,并取决于印度总督的判断。如果日本教会拥有某些固定资产,将扣除其中的相应份额。此外,敕令还禁止耶稣会上从事生丝贸易和其他一切的商业活动[4](pp.377-378)。1610年2月20日,葡萄牙国王又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件中重申了这一命令,同时,严禁日本修道士们从事商业活动,要求停止生丝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即使是澳门商人以这种方式作为捐赠也不行[4](pp.380-381)。我们不知道国王做出这些承诺时有多大的诚意,但从他斤斤计较的一系列附加条件看,他兑现这些承诺可能要比他做出这些承诺困难得多。

尤独有偶,远东耶稣会士也常常不能准时获得教皇支付的年金。范礼安在1578年11月20日于果阿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说:“在教皇(答应)给予的6000克鲁扎多中,至今为止,还有4000克鲁扎多没有到达印度。”[4](p.390)范礼安在1587年7月23日于澳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说:“葡萄牙管区代表在写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了以下事情:在教皇西格斯特五世给予日本的6000特卡特年金以及捐赠——即对已故格里高利13世给予数目的确认,其中还包括增加的2000(特卡特)中,1586年只征收了3500(特卡特),从这些帆船驶向印度的1587年至今,再也没有征收过。我们不知道还能否征收。”[4](p.390)1595年11月23日,范礼安于果阿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说:“提到教皇给予的年金,正如阁下所知道的那样,西格斯特五世只给了一年,而在此后的三四年中,一次也没有支付过。”[4](p.390)1596年12月16日,范礼安在给总会长的信中说:“马塔神父(Mata, Cabriel de)这样对我说,教皇下令,今后将支付格里高利13世给予日本的4000特卡特的年金和西格斯特五世追加的2000,并下令从今年开始征收。由于他没有收到会计报告书,葡萄牙方面从未将它送来过,所以我不知道以往的征收数额。我不知道教皇是如何下令支付这2000特卡特的,但今年到达当地的只不过3000特卡特。”[4](p.395)在1598年8月加津佐第二次日本耶稣会士全体会议的记录中,作者声称:“与如此大量经费相比,它(教皇年金)的增加极为有限,而且,它还是不确定的,从未全额到达过。其中包括无法支付和在海上的损失……全体成员希望视察员能将日本所面临的危险正确地通知总会长,并希望总会长能够告诉教皇,6000克鲁扎多的年金捐赠必须支付。每年应确实送往日本。”[4](pp.392-393)

在17世纪中,教皇年金的支付状况似乎没有改善,我们在传教士信件中还看到一些更为荒唐的离奇借口。据1603年10月6日范礼安于澳门写给总会长的信件,1602年未能支付教皇年金是由于钱袋在果阿卸货时不慎落入海中[4](p.398)。范礼安在1604年4月9日于澳门写给总会长助理的信中居然说,长期未能兑现的教皇年金,是因为教皇的大敕书被遗忘在马德里档案馆的柜子中,没有向税吏们出示[3](p.284)。

关于教会第三种经费来源的不动产^①,其有限的数额与庞大的传教经费相比,亦是杯水车薪。

^① 这些固定资产,葡萄牙语为“renda”,西班牙语为“renta”,意大利语为“rendita”。参见《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455页。远东耶稣会购置固定资产可能始于1570年。同年1月10日,耶稣会总会长博尔哈(Francisco Borja)在写给印度教区视察员阿尔瓦雷斯·贡萨罗(Goncalo Alvares)的信中明确指示说:“我希望用耶稣会士在日本获得的钱,为他们购入可以维持他们的某些资产。”参见《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454页。1571年11月3日,因病返回印度的费雷拉神父在于果阿写给总会长的信件中声称,日本教会从贸易赢余中抽调了10 000至12 000克鲁扎多送到印度,用以购买固定资产。”参见《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232页。

范礼安在1575年12月4日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声称：“日本还在(印度)帕萨英(Bacaim)附近购买了各种资产,拥有来自那里的1000(克鲁扎多)的收入。其中包括在我来到东方后购买的两处不动产,从那里可以获得500斯格特的收入。其中一处是用1200(克鲁扎多)购买的,另一处是用4000(克鲁扎多)购买的。”[4](p.456)除了印度帕萨英附近的不动产之外,耶稣会士在日本也拥有一些不动产。其中主要是在1580年由大友纯忠送给教会的长崎和茂木。在这个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教会不仅向居民收取固定的地租,而且每年还从入港交易的葡萄牙商船那里征收1000克鲁扎多的港口停泊税[5](p.36)。

与这三项固定收入相比,信徒们的捐赠更不稳定。尤其是贫穷的日本人,他们的奉献数量有限。范礼安自己也承认:“这里的村民十分贫困,对他们不能有任何期待。”^①

与此相比,葡萄牙商人的捐献要多得多。加戈神父在1555年9月20日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信中提到,携沙勿略离开日本的(葡萄牙)船长曾给他们带来银子、衣服、奴隶和蜡烛,以及其他传教士们需要的东西[7](p.193)。阿尔梅达在1561年10月1日于丰后写给印度管区长的信中提到:“五艘船的来航带来了丰富的教会用品。葡萄牙商人从平户为这里的教会带来了画像、(祭坛用的)挂毯以及其他装饰品。”[7](pp.378-379)然而,来自于本国同胞的海外捐赠并不稳定。除了前述马六甲总督赠送给沙勿略的30桶上等胡椒,我们所能找到的较为丰厚的私人捐赠只有两笔,即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1556年在日本加入耶稣会时的个人捐赠,以及范礼安前往日本的途中与“印度商人和我们那些信仰虔诚的友人们协商”后募集到的6000克鲁扎多[5](p.151)。

综上所述,远东耶稣会士的固定经费来源是有限的,即使葡萄牙国王与教皇的年金能够及时地全额到位,亦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费需求。正因为如此,范礼安才会在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强调说:“(解决这一问题)是必要的,它使我放弃其他一切工作,寻求在日本增加收入的方法……救济日本需要大量的资本。在中国的港口完全找不到方法。指望印度总督的救济是愚蠢的。他没有任何可以给予的东西,而且从日本到印度往返需要三年,所以这期间神父无法在住院中生活,将会饿死。何况要求葡萄牙的救济更是愚蠢。”[5](pp.148-149)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总会长:“我们不得不使用我主基督赐给五块面包和两条鱼的方法,来增加这笔经费。因为到现在为止,支持这些设施只有从中国来的(葡萄牙)船的贸易……过去就是依靠这笔收入维持生计。”[5](pp.140-142)。

三

在耶稣会的官方文献中,我们还找不到耶稣会士最初参与中日贸易的确切时间,但曾任日本布教长的卡布拉尔神父在1571年9月6日的信中说:“修士阿尔梅达带着4000至5000克鲁扎多加入了修会,就是用这笔钱开始了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罪恶的商业贸易。”[4](pp.582-583)由此看来,传教士开始进行商业活动的时间,很可能始于阿尔梅达1556年在日本加入耶稣会之后^②。还需要注

^① 参见《日本巡察记》第140页。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信徒的捐献并非如范礼安所说的那样少。阿尔梅达修士在1559年11月20日于丰后写给果阿学院某修士的信中说:(教会)医院有了很大的发展,维持它的捐献也同样增加了。在过去的1个月中,有300克鲁扎多的捐赠,当地一位妇人独自捐了100克鲁扎多(《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3期第1卷,第281页)。另弗洛伊斯1577年9月19日的信件亦表明,在1年的时间中,日本信徒为京都教堂捐赠了不少钱财。那些金银、大米和其他物品价值2000克鲁扎多(《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3期第4卷,第386页)。小西行长从朝鲜回来后,向各地住院捐了2000克鲁扎多,还给了主教塞尔凯位价值500克鲁扎多的大米(《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1期第3卷,第158页)。

^② 我们或可做大胆的推测,经商致富的成功经历,可能使阿尔梅达成为商业活动的最初建议者和牵线人。而前述弗洛伊斯1555年提出的建议,亦可能起了某些推动作用。

意的是,耶稣会士参与中日贸易与澳门开往日本的葡萄牙定期商船^①有关。据考证,第一艘前往日本的定期商船是在葡萄牙人1557年入住澳门之后。由此推断,传教士不仅是定期船贸易的最初参与者,而且还可能在这种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尚不为人知的重要作用。

由于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及其参与贸易的时机把握,最初获取的利润是很可观的。1571年11月3日,因病返回印度的费雷拉神父在从果阿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说:“初期的生丝贸易获利巨大。另一方面,需要经费的布教团亦为数不多,所以资产大致增长到18 000克鲁扎多。”[4](p.232)费雷拉在第二年1月23日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又说:“(因生丝贸易而得以储存的)这笔钱在增加,已经达到20 000克鲁扎多。”[4](p.232)

由于生存需要,曾斥之为“罪恶的商业贸易”的卡布拉尔很快改变了态度,他在1575年10月2日写给印度管区代理管区长曼努埃尔的信中解释说:“现在除了从贸易中获得一定数额的资金之外,我想不出其他收入渠道。由此而获得的储蓄,每年超过上述4000特卡特。”[4](p.583)他在1578年10月15日于白杵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再次申辩说:“为了维持日本基督教界和传教事业,我们的收入只有下列形式的来源。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投资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航海。这一投资额极为有限,最多时也不过8 000至10 000克鲁扎多。它一方面使经费增加,同时还扩大了资金积累……到七八年前为止,我们在这一航海中投入的资金在12 000至15 000克鲁扎多,用这些钱购入的商品通常来自于中国。(当时)日本耶稣会士只有8人,布教成果亦不及今日的二十分之一,而现在该管区的耶稣会士超过了50人。”[4](p.584)

在卡布拉尔的支持下,一度因抽调活动资金而受影响的贸易活动很快恢复了元气。范礼安在1579年12月5日于从口之津写给总会长的信件中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提供了交易的细节与赢利数额。他说:“计算我们的资金和可用于其他卖买的资产数额,我们现在所有的资金总额超过了20 000塔埃尔,换算成我们的货币,正好相当于30 000斯格特。这其中每年大致有8000(塔埃尔)从当地送往中国,购入生丝,在年内送到日本。这些生丝用我在别的信中所说的方法出售。这一赢利可以确保我们的经费以及再次送往中国的资金。扣除贸易船所需的所有费用,这一赢利达到每年2000以上。剩下的7000斯格特按照我在其他书信中所说的方法(加以处理),在贸易船出港时,同船的代理人将相当于这一份额的生丝留给我们,而我们则向他支付这一代价。然后这些生丝在当地被出售,同样也可带来2000多斯格特的赢利。这4000斯格特和在印度帕萨英地区收入的1000,能够维持日本的耶稣会士。此外,我们在日本的所有一切住院和教堂也需要许多数额的经费。因此,这30 000斯格特中的15 000通常投资于生丝,而这些生丝的一半由前述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船带来,剩下的一半被留在日本。”[4](p.585)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范礼安都是远东耶稣会传教史上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他在1578年至1583年对中国澳门以及日本教会的首次视察,不仅重新开启了中断已久的中国传教事业,而且使耶稣会士的商业活动进入了新的时期。作为耶稣会远东传教区的最高负责人,范礼安未必不清楚葡萄牙国王和教皇能够提供的资助限额,他之所以在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喋喋不休地谈论日本耶稣会面临的危机,其本意并非是将矛盾上交,希望欧洲方面大幅度地追加投入,而是想使总会撤销传教士参与中日贸易的禁令,认可其先斩后奏的果敢决定。范礼安在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信赖我主的教义,信赖耶稣会以及它对于这一新教会的关爱。但我认为,我主教义的效用之一,便是赋予我们这般思考和努力的力量,以便让我们使用一切可能的、合乎理性的

^① 前往日本的定期商船(队)通常为一年一度,由一艘或几艘商船组成。负责人是被称为Capital(加比丹、甲比丹)的船队首领,他既是商业活动的总管,同时也是当年澳门地区的行政长官。始于1550年的这一制度起初是作为对有功于国家者的奖赏,后来扩大为各地商业负责人的称呼。参见岩生成一《锁国》,第34—37页。

方法来努力寻找救济手段。事实上,日本的基督徒和耶稣会正维系于这危险极大的(中国贸易)一根丝上……一旦失去它,就会完全丧失生活手段。”[5](pp.148-149)

范礼安充分运用视察员的特殊身份与权力,在罗马耶稣会总会尚未对他的要求做出明确答复之前,先斩后奏,使原本羞答答的秘密勾当,成为冠冕堂皇的公开活动。他在1578年第一次抵达澳门时,便富有远见地与当地葡萄牙商人达成一项协议,即在每年前往日本的定期船中,为传教士保留一定份额(大约50皮高的生丝)^①。不久,又下令派驻各地的管区代表(Procurador)专事此职^②。从此之后,日本耶稣会传教士的商业活动便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四

由于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及其商业活动牵涉到各方面的实际利益,明目张胆的经商活动在教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随着教会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赞成与反对的争辩也达到了高潮。正是在这些争辩中,相关各方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士面临的巨大压力来自于教会内部。1592年1月23日,马丁斯神父(Fernao Martins)在从澳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一再对这种世风日下的堕落深感痛心,他以几乎声泪俱下的沉痛语气诉说了自己的矛盾心态:“我想让阁下知道的第二件事是关于日本(耶稣会)的贸易。对此,我认为如果阁下能来实地看看,就不会对我们有如此非难,而且其中还有更为严厉的指控。这么说是因为如果全面废止这一贸易,便可消除对我们来说的严重麻烦,不再招致别人的憎恨,另外寻找供养日本神父的其他收入来源。贸易已经成为我们的负担。原因是我们获得了商人的名声而失去了修道士的名声。有人将这个住院称为‘修道士的住院’,但也有人当着我们的面称之为‘交易所’。”[3](p.94)

奥尔格基诺神父(Organtino Gnechi Sokdo)的忧虑如出一辙。他在1592年10月4日写信给总会长说:“我非常担心我们的上长与其他全体会员过于亲近这一世俗事务,过度追求物质与肉体上的安乐,从圣职者变为领主,从贫者变为富者。我这么说并非是请您判断现在进行的贸易已无必要,而在于重视它必然使我们的精神隶属于它,使我们成为可视之物的奴隶。”[4](p.341)

与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出发点不同,那些曾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后因种种原因改变初衷者的反戈一击无疑具有更大的杀伤力。1583年10月5日,被范礼安撤销日本布教长之职,改任中国教区布教长一职的卡布拉尔神父在澳门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说:“无论如何谨慎从事,这种商业活动也不够妥当,所以招来了人们的反感。正如时常在日本所见到的那样,虽然我们从当地送往日本的生丝中获得了许多赢利,但他们并不因此满足,日本的管区代表又与定期船的商人们约定,以与其他生丝售价相同的价格从他们那里购得大约250至300皮高的生丝,用船将它们运往别处,在那里以比定期商船更高的价格出售它们……该神父因此获得了3000到4000克鲁扎多的赢利。定期船的商人对此颇感遗憾。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这个港口,丑闻实在太多了。”[4](pp.337-338)

1596年12月10日,改任印度教区管区长一职的卡布拉尔再次从果阿致信总会长说:“在澳

① 皮高(pico),担。马来语,重量单位。以一人所能承受的重量为基准。但又因时、因物、因地而有所不同。其重量大约在61公斤至62.5公斤之间。参见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东方案内记》(《大航海丛书》Ⅶ),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246页注释7。

② 除了日本本土,管区代表还被派遣到澳门、马六甲、果阿,甚至是欧洲的里斯本与马德里,负责催促并管理日本教会应得的年金和某些不动产的收入,负责采购、打包、装运送往日本的生丝等商品,制定价格、贩卖和财务结算等等具体的经济事务。为了使他们的工作更少羁绊与干扰,范礼安还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他们可以超越所在住院的上长管辖,按照他们的判断从事经营活动。详见卡布拉尔1583年10月5日于澳门写给总会长的信件。参见《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337-338页。

门,人们对耶稣会的商业活动存在着极大不满。在那里,日本的管区代表苏亚雷斯神父(Soares, Miguel)在神学院中拥有自己的交易,那里不断有商品出入,中国商人频繁地出入其中。该神父不仅通过其他人进行交易,而且还自己去商店购买商品。除了为送往日本的商品进行大量投资之外,(他)还购买商品,以比当地更高价格转卖这些商品。由于资金的数额非常巨大,他可以用这笔钱买下从外面送到这里(澳门)的全部商品。所有的人们都诉说此事,表示不满……耶稣会神父成了公开的商人,他们提供了非常恶劣的榜样,它使我们的名字蒙羞。”[4](pp. 346-347)

卡布拉尔出尔反尔的态度,也许和他与范礼安的传教策略分歧有关。他的这一指控显然有挟私报复之嫌。对此,范礼安在1595年11月23日写给总会长的信中反唇相讥道:“他(卡布拉尔)在日本担任布教长的当时,(日本)国内必须维持的人只有10位神父与10位修士,但在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中,总是大量交易100乃至120皮高的生丝以及其他的黄金、水银、铅、反物(按,指制作和服的布料)等等商品。它们根据他的命令在日本被出售,而且用当时的钱积蓄了30 000特卡特以上的资产。”[4](p. 593)

与范礼安颇为激愤的态度相比,准管区长科埃里(Gaspar Coelbo)的语气要缓和一些,但他的立场却十分坚定。他在1581年10月13日于日本写给总会长的信中承认,“这违反了耶稣会的会规,违反了所有修道誓愿的规定。”但同时又指出:“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维持我们日本耶稣会员和日本基督教界,一切贸易都会被禁止……但在无法提供其他方法之前,它不能停止。”[4](p. 337)

1618年9月30日,视察员维埃拉(Francisco Vieira)在写给总会长助理的信中说:“(生丝贸易)是维持日本耶稣会的主要财源。如果卡瓦略神父致信说可以放弃它,那么,他就是对这一管区的物质供应不闻不问,或是一无所知。”[4](pp. 359-360)面对远东传教士们的商业活动及其相互指责,耶稣会总会表现出左右为难的矛盾态度。早在1578年12月4日,总会长默尔肯利(Everard Mercurian)写给范礼安的信中就重申印度管区会议全面禁止这一贸易活动的决定,但同时又扭扭捏捏地同意“暂停这一(命令的)执行。”[4](pp. 335-336)

1585年12月,另一任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o Aquaviva)在写给范礼安神父的信中说:“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为了维持日本的人们而在中国进行生丝贸易,是因为不得已的事情而获得允许的,并非耶稣会与教皇的本意。但是,为了救济许多灵魂的精神贫困,它又是必要的。因为在日本没有福音传播者,他们就会死亡。因为我们无法断定还有其它方法可以维持这些信仰传播者。”但他同时又说:“我们应该禁止这种贸易。因为我们确认,您在澳门所行的事已经导致当地对这种贸易的非难与批评。在澳门的住院中,要求纠正此事的希望非常强烈,有不少人写信给我们。所以,上述贸易被视为不正当之事并加以禁止是适当的。”[4](p. 339)

1604年12月13日,总会长阿夸维瓦在写信给日本准管区长的信中,下令耶稣会士不得在日本参与生丝价格的确定,不得在住院中进行生丝分配。1608年12月9日,该总会长在给日本管区长的指令信中,重申不允许耶稣会士介入生丝分配。1612年3月28日,他又在给日本管区长的信中命令耶稣会士不得为他人代理贸易。在1614年3月25日的另一封信中,他同意将生丝贸易限于国王所允许的一定数量的范围之内。1616年1月5日,总会长在写给日本管区长的信中,再次重申这一禁令,但同时又应允,无法拒绝的日本国王的要求可以例外[4](p. 357)。

与教皇含糊不清的指示相比,世俗统治者的态度要干脆得多。在1607年8月2日的敕令中,西班牙国王规定了以下几点:(1)已故国王菲利普二世支给日本耶稣会士的、在第5年加以变更的1000克鲁扎多将是永久性的。(2)新付给2000克鲁扎多的年金,在印度设立支付机构,但这笔钱支付与否取决于印度总督的判断。(3)与(原)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确定的1000克鲁扎多的年金合并,年金总额为4000克鲁扎多。(4)如果耶稣会在日本没有固定资产,这笔年金可以确保供应。如有其他收入,将扣除相应份额。(5)禁止日本耶稣会士从事生丝贸易和其他一切商业活动

[4](pp. 377-378)。

1610年2月20日,国王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重申了这一禁令,严禁日本传教士从事商业活动,停止生丝贸易和其他所有的商业活动,即使是澳门商人的捐赠也不行[4](pp. 380-381)。

由于这些商业活动牵涉到各方面的实际利益,有关各方谁都不愿意让步,激烈的争执与相互攻讦一直没有停息,直到耶稣会士在17世纪30年代被逐出日本,葡、西两国的海上强国地位被荷兰、英国等新兴国家取代后,这一不分胜负的争执才不得不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正如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文化或宗教,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纯粹的文化交流与宗教传播。在“胡椒与基督教”这一帝国海外政策指引下,无论是从事商业活动的耶稣会士,还是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其身份决不是单纯的传教士,其使命亦不可能是单纯的信仰传播。他们的商业活动与大航海时代的特定历史情境息息相关,并具有复杂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作用。

关于耶稣会士在远东的商业活动,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做深入的个案分析,例如这些商业活动的主要商品、赢利情况、贸易形式、主要参与者、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对信仰传播和传教策略的关系等等。因篇幅所限,拟另文专述。

[参 考 文 献]

- [1] 沙勿略(河野纯德译). 沙勿略全书简[Z]. 东京:平凡社,1985.
- [2] 岩生成一. 锁国[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85.
- [3] 高濂弘一郎(译注). イエズス會と日本:1[A]. 高濂弘一郎. 大航海時代叢書:第2期[Z]. 东京:岩波書店,1981.
- [4] 高濂弘一郎. 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M]. 东京:岩波書店,1977.
- [5] 范礼安(松田毅一译注). 日本巡察记[M]. 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本,1985.
- [6] 松田毅一(译注). 十六・七世纪イエズス會日本報告集[Z]. 东京:同朋舎,1991.
- [7] 松田毅一(译注). 十六・七世纪イエズス會日本報告集[Z]. 东京:同朋舎,1997.

[责任编辑 徐 枫]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Japanese Far Eastern Jesuits

QI Yin-ping

(The Center of Cross-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Profitable business activities have rarely been touched upon in the study of Jesuits. But there have been no more pur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exchanges than pure culture or religion. This problem needs due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 into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November 5, 1549, Francisco Xavier wrote to Governor of Malacca in the third month after he arrived in Japan, proposing the position of a business office and a list of appropriate goods to be managed by missionaries. On July 22, 1552, he proposed a similar business office in China on his way to China for the benefit of the King of Portugal and sent the letter in care of a Portuguese merchant.

Missionary concern over worldly affairs is related to religious traditions, national interest and missionary strategy, but the most direct and important reasoning was the need of subsistence. Xavier's financial resource in Japan was the superior pepper offered by officials of Malacca. But with increased

missionaries and expanded activities, the expenses soared, rising from 2 000 to 10 000 humctuzado in 1570 - 80.

Theoretically,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Jesuits were divided into 3 parts: annuity from the King of Portugal, that from the Pope and income from the little realty bought for the local mission. However, the annuity was often absent due to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the local income often scarce. Therefore, the only option was to get involved in business transactions.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Far Eastern Jesuits date back as early as 1571, and the earliest one to practice this might be Francisco Cabral, who was in charge of Japan and China congregations. He began "criminal commercial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 money donated by a Jesuit. During Alessandro Valignano's first Far East inspection in 1579 - 82, this was institutionalized. He signed a contract with Macao Authorities stipulating the share of silk at 2 500 kilos for the Church on the annual liner to Japan and appointed business agents in Japan and Macao in charge of material storage, flow, sales and fund allocation.

Force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church were against the move, and their monastery in Macao was called an "exchange". Many people were worried about missionary merchants. There were decrees from the Pope, the Head of Jesuits and the King of Portugal against this. This dispute was complicated b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ngregations.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were severely attacked. However, the need for survival prevailed, and these controversial activities obtained sustained development.

These activi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a new Far East trade system as well as the fashion and strategy of missionary work.

Key words: Japan; Jesuits; business activities

本刊讯 在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浙江大学共有64项成果获奖。其中著作类一等奖3项,获奖者和获奖著作分别为: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下卷)、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二等奖16项,获奖者为汪斌、潘立勇、钱文荣、顾国达、徐岱、殷企平、张国清、毛丹、王云路、王为农、卢向前、陈劲、吴秀明、郁建兴、陈国权、冯钢等;三等奖16项,获奖者为陶然、沈满洪、沈松勤、王勇等。论文类一等奖共有3项,获奖者和获奖论文分别为:陈剩勇《礼的起源——兼论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吴洁敏《汉语篇章节律研究》;二等奖7项,获奖者为胡税根、金彭年、丁关良、冯筱才、叶航、杨明、金雪军等;三等奖8项,获奖者为马庆国、王小章、丛湖平、孙笑侠等。另外,获著作类优秀奖5项,论文类优秀奖6项。